

“掏心”战术取车桥 攻点打援双胜利

■ 戚苏源 王玉琨



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收复车桥的消息



车桥战役烈士纪念碑

千年商业古镇车桥镇，位于江苏省淮安市东南方向25公里处，是连接苏中和苏北的枢纽。相传横穿集镇的洞河上架有5座木桥，如整体字“丰”字的五横，洞水流经其下，如“丰”字中间一竖，因而取名“车桥”。1944年3月，我苏中军区在车桥镇发起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围歼阻援战，史称车桥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采取“掏心”战术，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吸引周围敌军来援，我阻击部队歼击援敌，从而取得攻点与打援的双胜利。

充分研判战场形势，全面考虑定下决心。1943年，侵华日军占据车桥镇，在车桥镇外设置10余个据点，把车桥据点围在当中。同时，日军在车桥镇大肆修筑工事，在车桥周围建起土围，土围上林立大大小小53座碉堡，每座碉堡间隔两百米左右，火力能够相互配合，还有暗堡封锁地面，外围由伪军把守，内侧由日军防守，在外围还挖筑了壕沟。

面对这样的形势，对于如何夺取车桥，苏中军区共讨论了3个作战方案：第一，先集中力量攻占河口，再夺取车桥；第二，同时对河口、车桥发起进攻；第三，先打车桥，再打河口。

第一个方案虽然背靠新四军第3师根据地，但日伪军对河口防守甚严，即使能攻下河口，也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第二个方案虽然能速战速决，但兵力分散，不利于机动，一旦不能迅速得手，将会陷入被动。第三个方案，采取“掏心”战术，绕过河口、曹甸等据点直取车桥，出奇制胜，从而孤立河口、曹甸，便于我军整个战役展开。经权衡利弊，苏中军区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使用“掏心”战术，直插车桥。

积极开展作战准备，积蓄力量准备进攻。定下作战决心后，我军便积极进行作战准备。1944年初，苏中的新四军

主力部队已达到20个团，共计3万余人，并且集中进行过冬季练兵，技战术能力有较大提升。此次战役，苏中军区集中5个主力团，分别为新四军第1师第1团、第7团和第52团，苏中军区教导团和第4分区特务团，都是苏中新四军的绝对主力。苏中军区首长粟裕提出“组织战”理论，关键点就是实行大兵团作战中的协同作战。参战的5个团作战风格不尽一致，苏中军区就把互相了解、作战特点相似的部队临时编组，共编为3个纵队、1个总预备队，并适当调整部队建构成和干部配备。苏中军区还将师机关分成两个梯队，1个梯队北移，1个梯队南移，来吸引日军注意力。当时无论是日军还是伪军，对我军作战意图和部署都一无所知。苏中军区还事先为攻城部队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用于登城的就有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等，突击队洒水游过外壕后，便可以借助这些器材爬过土围展开攻击。

凭借我军相当深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苏中军区发动3万多民兵和群众，在车桥一带的水网地区筑路打堰，以便部队隐蔽接近车桥。同时，还发动千余民兵，把部队、物资、担架队运送到车桥附近。

“掏心”战术直插车桥，攻坚打援同时进行。参战3个纵队中，1个纵队攻坚，另外两个纵队打援，攻城主力为新四军第1师第7团。粟裕在战前对该团指战员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你也要给我砸开它！”3月5日凌晨2时，第7团利用夜暗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在炮兵大队支援下，突击队勇闯外壕，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越过土围攻入镇内。随后，我军数个战斗小组在炮兵大队配合下分散突击，逐个消灭日伪军火力点。战至午后，摧毁

碉堡50余个，全歼驻守敌。紧接着，我军又分两路向日军发起攻击，攻占暗堡、库房等处。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日伪军之际，根据情报，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第60大队先在淮安集结，由山泽大佐指挥，正分5批驰援车桥。第一批淮安来援日军约240人，乘坐7辆卡车，接近我军在车桥以西芦家滩一带的阻击阵地，在距我阻击阵地500米时，我阻击部队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敌在混乱之中进入我预设雷区，地雷爆炸后，我军奋勇出击，全歼敌人。日军后续部队得知此消息，便不敢沿公路行进，迂回到韩庄固守。随后，日军在黄昏时多次偷袭我阻击阵地，19时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越战越勇，主动向日军固守之韩庄发起攻击。由第1团第2营和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从4个方向扑向韩庄日军，将日军截成4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22时，我军俘虏身受重伤的山泽大佐。此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河口、曹甸等日伪军据点12处，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车桥战役大获全胜。

当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粟师以兵力雄厚”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祝贺，陈毅等军首长也给苏中军区发来嘉奖令。车桥战役打乱了敌人的“清乡”“屯垦”计划，进一步加强了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揭开了华中抗战战略反攻序幕。

史说新语

百战奇略

原典

《百战奇略》赏战篇原文为：凡在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争先登，白刃始合，士卒争先赴者，必诱之以重赏，故敌无不克焉。法（指《三略·上略》）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赏战篇大致内容为，无论是在攻城作战中遇到高墙深壕，箭石交下的情况，还是当两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时，要使士卒奋不顾身地前赴后继，奋勇杀敌，都必须以重赏来激励他们。如此，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诚如兵法所说：“重赏激励之下，必有勇士出现。”该篇旨在阐述攻坚克难时，以重赏调动士气、激励部队斗志。

战例

公元207年，曹操准备北征。决策时，有些将领认为军队久战中原，人疲马乏，需要休整，希望曹操三思，但曹操孤注一掷率军北上，一路上凶险环生。归来后，曾劝谏过曹操的将领惶恐不安，忙下跪请罪，曹操却重赏他们，并表示这些将领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厚赏。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华东野战军情报部门“四中队”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派飞机进行轰炸的情报，部队得以及时疏散。事后，粟裕不仅表扬“四中队”，还奖励每人两斤猪肉。孟良崮战役中，“四中队”的周中昭潜心研究，发明了新破译方法，侦获极其重要的情报，粟裕当场决定给周中昭记一等功。

计谋分析

以上两个战例充分说明“赏战”的重要意义，赏之有术、赏之有道、赏罚分明能增强对部队的控制力，达到巩固己方的目的。

正确认识赏战是达到“赏战”目的之重要前提。赏的目的，在于激励斗志、鼓舞士气，运用得当就能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但也应清醒认识到，赏既是爱的形式，也应有威的体现。赏如果只是爱、不含威，这种赏只是一种溺爱，不可能造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因此，奖赏是一把“双刃剑”，指向必须要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就是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论功行赏，不搞平均分配，杜绝坐享其成、无功受禄的情况出现，就可用具体利益激励将士的进取心理与破敌勇气，从而保证每次战斗都能人人尽责、个个出力，是一种符合战争目标的正确价值方向引导。赏罚分明，悬赏激励与实施奖励一致，可促使官兵行为沿着所引导的正确方向发挥力量，是每战获胜的无形保证。曹操北伐失利后重赏谏臣，充分体现其在奖励激励部署上的风度。粟裕奖励有力，激励“四中队”多次提供准确情报，对帮助华东野战军首长正确决策发挥关键作用。

精神和物质奖励有机结合是实施“赏战”的具体手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更多是从物质、金钱方面去理解赏的内涵，但物质奖励并不是万能的。从古至今中外的战例可知，大部分的勇士并不是因利而战，而是为义而战。在这些义勇之士面前施赏，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因此，重赏不能只理解为物质、金钱，应该包括精神方面的沟通、人格的理解，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在实施“赏战”的过程中，赏的具

体手段应区分为两种：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针对具体需求将两者有机结合方能发挥“赏战”的最大效用。古代社会侧重物质层面上的奖励，动辄以钱帛、官阶等作为施赏的手段，而我军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奖励，如荣誉体系的构建，功臣等级的授予、组织的关怀等，这与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是分不开的。粟裕对“四中队”论功奖励，既注重为其实现作战价值提供物质保障，更强调荣誉奖励与关心个人。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粟裕不仅多次公开表扬“四中队”，同时要求副官处给“四中队”配备骡马、挑夫、汽车，在行军时为他们运送机器设备，保证工作顺利开展。不管是“两斤猪肉”，还是几句关心和表扬的话，都能极大调动指战员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爆发出巨大潜能。

把握赏的时机和限度是发挥“赏战”作用的保证。有效的赏能巩固己方实力，挖掘自身潜力，而运用不当，赏不准、赏不及时或赏之过滥，都会挫败士气、滋生怨气，助长投机主义行为，与“赏战”的初衷背道而驰，此时的赏反而成为一种纯粹功利性因素，就可能变成追名逐利、瓦解士气的腐蚀剂，这是实行奖励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因此，灵活把握赏的频度和限度是发挥“赏战”作用的关键。曹操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导致出师不利，大胆赏赏当初谏言的将领，使得上下一心，极大鼓动了部属的积极性。粟裕不失时机给“四中队”人员分发猪肉，第一时间给破译敌情做出突出贡献的周中昭记一等功，并多次对“四中队”集体予以表扬，可以说既突出了赏的时效性，又体现了赏的示范性，很好地发挥了赏的作用，达到了“赏战”目的。



孟良崮战役中向敌发起进攻的我军

微历史

以“扒”制枪

明朝建立之初就已受到倭寇骚扰，嘉靖（公元1522年至1566年）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在卫所制度废弛的情况下，明朝在招募士兵，训练新军的同时，也征召僧兵等地方武装参战，少林弟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正德（公元1506年至1521年）年间就已有少林弟子与倭人交手。据《宁波府志》记载，这位少林弟子名叫边澄，老家在宁波以东慈溪，在少林寺学艺3年，后浪迹江湖未逢对手。有来明朝朝贡的倭人自负枪法高超，提出要同边澄较量，在宁波知府张津的允许下，边澄应战。

较量开始后，10多名倭人向边澄冲去，但他们手中的枪都被边澄打落。以少敌多仍能取胜，是因为边澄使用的兵器能够克制枪，称为“扒”。这种兵器在长木柄上安装一块横木，横木周边密布铁齿，形似铁耙。在战斗中，能够缠住敌方刺来的枪头，在难解难分之际，功夫到家的一方能够轻易使敌方兵器脱手。所以，在边澄本身功夫高超，又使用合适兵器的情况下，倭人以多敌少仍没有机会取胜。

“竟敢指望我离开我的将士们！”

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不如他的伯父，在普法战争之前和期间，他在外交和军事上的表现都十分拙劣。但拿破仑三世也有过“高光时刻”。

在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的苏法利诺战役中，继承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军的优良传统，当时法军军官也经常靠前指挥而遭受伤亡，连军一级指挥官也亲临一线指挥。

苏法利诺战役中，法军两名师长因指挥位置靠前被奥地利军队的流弹击中，抬下战场。此时，拿破仑三世亲自推了自己的指挥位置，他身边的好几个亲随被奥军子弹击倒，就连他自己的一侧肩章也被流弹打掉。众人劝说拿破仑三世退后一些距离，以免出现意外。据说，当时拿破仑三世厉声呵斥道：“这种时候，你们竟敢指望我离开我的将士们！”这一刻的拿破仑三世颇有其伯父风范，此举也帮助他在法军中树立起权威。

（张杰）



米亚-4轰炸机是一种不成功的机型



阅兵是近距离观察武器的良机



红场阅兵式上，苏联研制备的导弹是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

苏联“圆圈舞”行动蒙骗西方

■ 丽君

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飞行员加里·鲍尔驾驶U-2间谍飞机在苏联乌拉尔地区上空击落被俘后，西方国家针对苏联的空中侦察活动不得不停到最低程度。因此，红场阅兵等阅兵活动几乎成为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近距离了解苏联武器装备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唯一渠道。

苏联在红场专门为驻苏外国武官设立观礼台。观礼期间，只要红场上一出现最新式的苏联武器装备，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这些西方国家的武官和外交官身份伪装的情报人员便像打了鸡血一样，举起手中相机一通狂拍。他们不仅在红场阅兵式上拍摄，还在列宁格勒，甚至是东柏林、布拉格的阅兵式上拍摄苏联武器装备。有时，这些情报人员还从游客手中购买阅兵式彩旗和阅兵式的照片。

“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反间谍部门老战士弗拉基米尔·涅恰耶夫回忆说：“他们手持邀请函，口袋里装着外交护照，公开合法地来到阅兵观礼台，拍摄这些武器装备，然后以某

种渠道把照片传回国内。通过对导弹弹翼形状、面积、数量，导弹尺寸和直径、整流罩形状等细节进行分析后，就可以得出最终鉴定结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太空历史处负责人詹姆斯·戴维透露：“在这些阅兵式上，我们拍摄了非常详细的照片，这是其他途径根本无法获取到的东西。”这些照片配合西方国家获得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遥测数据，便可以弄清导弹的级数、所用燃料、战斗载荷和射程。

对于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这些活动，“克格勃”自是心知肚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克格勃”反间谍部门充分利用这一良机，开展假情报和反间谍行动。

俄罗斯历史学家奥列格·赫洛布斯特夫指出，“除真实装备外，阅兵式上经常展示一些所谓‘死结式’产品，也就是武装力量决定放弃采购的产品，目的是迷惑敌人”。还有一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武器装备模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5年8月在

莫斯科西北部图申机场举行的苏联空军阅兵式。阅兵期间，米亚-4轰炸机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超低空掠过机场上空，在西方国家情报人员看来，这些轰炸机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像，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威力巨大的轰炸机正在几十架、甚至几百架地从苏联飞机制造厂的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下线，就像肉类加工厂生产香肠一样简单。

但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飞行大队的杰作。该大队所有米亚-4轰炸机，间隔3分钟一遍又一遍地绕圈飞越观礼台上空，造成苏联已拥有庞大轰炸机机群的假象。这就是“克格勃”精心策划实施的“圆圈舞”行动，其目的就是让在场的西方国家情报人员亲眼看见，苏联已将军工资源集中到重型轰炸机的生产上，但实际上苏联正在加快步伐，积极研制生产洲际弹道导弹。

链接历史